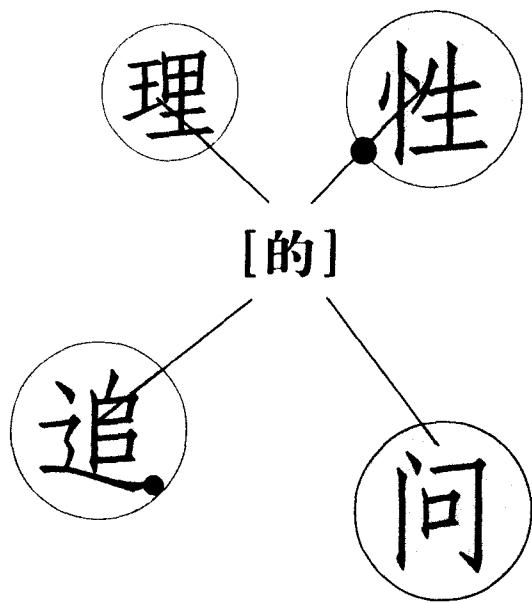


——关于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对话

汪丁丁 叶航 著



——关于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对话

汪丁丁 叶航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性的追问: 关于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对话 / 汪丁丁,
叶航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12
(时代思想与艺术丛书)
ISBN 7-5633-4328-8

I. 理… I. ①汪… ②叶… III. 经济理论
IV.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137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889 mm × 1 194 mm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20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6 000 册 定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 汪丁丁

逻各斯，或者“道”，它的许多性质当中最令人困惑的，是它必须通过“对话”才可能揭示它自身。我相信，许多读者甚至在读到这句话时，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这是“令人困惑的”，这不就是我们中国寓言所说的“盲人摸象”吗？

是的，盲人摸象，我经常用这一比喻来阐述我所谓“对话的逻各斯”的道理。听过我这一阐释之后，大约百分之二的学生会提出疑问：我们根据何种理由假设了这群盲人所摸的象是同一象呢？这就是逻各斯的令人困惑的性质之一了，但还不是最令人困惑的。

赫拉克利特《残篇》是目前我们知道的最原初的关于逻各斯的话语，在那里，逻各斯被认为具有以下性质：(1)它是被大众分享着的；(2)虽然大众分享着它，大众却不认识它，熟视而无睹，置若罔闻；(3)世间一切事物的本质都是逻各斯，也就是“道生一，一生万物”的意思。

在上列性质中，如果缺了(1)和(3)，那么摸象的一群盲人所摸之象，便完全可能不是同一象，从而盲人之间的对话也就如同香港人所谓“鸡同鸭讲”了。

对话之必要性，基于赫拉克利特列举的逻各斯的性质(2)——我们都是“盲人”，我们虽然面对“象”，却不知其为何物。

这样,赫拉克利特列出的三项性质,奠定了当代“对话学”的全部基础。后来,我介绍布伯的对话神学和哈贝马斯的对话理论,心里想着的,就是赫拉克利特的《残篇》。

上面的这番道理,在提出了疑问的、大约占全体学生人数百分之二的那些学生当中,有大约百分之五最终理解了,并且由此而激发出进一步追问的兴趣。可见,赫拉克利特当初对自己的观点是否能够为人理解所抱的悲观态度,是很有根据的。

更进一步,哈耶克所说的最重要的问题——社会为什么能够利用分离着的人类知识,也就获得了来自赫拉克利特的支持。因为性质(1)和(2)是关于人类知识的存在方式的陈述,即认识论陈述,而性质(3)则是本体论陈述。哈耶克的问题,原初地,已经包含在赫拉克利特的认识论陈述里了。

2002年年底,诺贝尔委员会把经济学奖授给了实验经济学的开山与掌门人佛农·史密斯。足以引发经济学家更大兴趣的是,史密斯在得奖前不久,已经进入了脑科学研究领域,并且从他开创学派的亚利桑那大学,转到了由布坎南创设的“公共选择”学派所在的大本营乔治梅森大学。在新的工作基地,史密斯把他从事的研究命名为“脑神经经济学”,并且声称,他所要做的,无非是论证哈耶克在半个世纪前表述过的那些基本原理。此处无法阐述这些基本原理,况且,如上述,只有百分之二的学生中的百分之五(即千分之一),有兴趣追问这些基本原理。

再回去讨论逻各斯的两项性质。根据(2),我们需要对话;根据(3),我们相信这对话是关于同一世界的对话;根据(1),我们相信参与对话的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发言,从而我们愿意倾听他们的发言。

带着这样的信念,我接受了每年在浙江大学讲授一个学

期课程的邀请，并且认识了浙大经济学院的叶航教授。从名字的谐音，我知道，叶航是杭州长大的孩子。这里“孩子”一词是双关语。虽然他比我年长两岁，认识他的人不难同意我的看法，他带着孩子般天真的性情。所以，我们两个“大孩子”马上就成了好朋友。

在学术方面，叶航的追问也和孩子差不多——所提之问，多为主流经济学家所不问。所谓“主流”事业，用一位我喜欢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朋友的话解释，就是“养活了多数人”的事业。既然被“养活”，主流经济学家所不问的问题，通常也就是无法为提问者带来收益的那类问题。换句话说，作为经济学家，执迷不悟地非要追问这类不会有收益的问题，难免被人家视为未“成熟”。凡没有长大的人，谓之“孩子”。

2400多年前，苏格拉底在雅典的市场里四处追着人家辩论哲学问题，终于惹得全体公民议决：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从此，知识分子都明白，“言说”是可以带来杀身之祸的。对话的逻各斯，不仅因逻各斯的性质而变得艰难，而且因对话而变得危险。

好在我和叶航都处于不愁衣食的境地，“不愁”，并不意味着我们十分富有，只意味着我们不在乎长远的衣食来源的问题。这样，我们就都有些闲暇来讨论只有“吃饱了饭没事情干”的人才想要讨论的问题。让我颇感惊讶的是，叶航居然有更多闲暇把这些讨论整理成眼前的这部书稿，打算出版了。

关于出版和言论，我有自己的看法。首先，我鼓吹言论自由，因为那是自由思想的制度条件之一，尽管自由言论的制度未必总能产生自由思想的人。当然，出版自由，作为言论自由的制度之一种，也随之而应予以鼓吹。

其次，我很少考虑把自己的言论整理出版。这是因为我骨子里太悲观，把一切思想的命运看得太悲观。这方面，叶航

比我乐观得多,所以,他才有更多闲暇来整理我们的对话。

第三,我不愿意把自己的言论规范到任何一种学术著作的框架之内,因为那样总会让我的言论丧失了它原初丰富的思想。用我一贯的说法,写专著等价于“作茧自缚”或者“画地为牢”,至少,它等价于承担着“体系之累”。我在一本讲义的自序里声称:如果将来有更加年轻的学者从后面追赶上来,让我感到自己的衰老,我就放弃我的追寻,返回家来写一部专著。现在呢?我独自行走在山顶上,四顾无人,前面还有风光无限,这让我十分不愿意写专著。

专著的写作方法,不论怎样选择,为了逻辑自恰和行文通顺,必须从一个特定的立场来叙述作者要描述的整个世界。从逻各斯的基本性质,我们知道,这样的方法是盲人摸象的必要过程,是必须遵守并且予以鼓励的,今天被叫做“学术规范”。

盲人摸象的另一个必要过程,是超越全体特定角度的叙述,从“象”之为象的立场来描述事物。可惜,没有人能够实现彻底的超越,因为人之为“人”,其理性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我常常思考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叫做“跨学科协调”问题。在人类所采取的无数个不同的立场上,积累了如此大量的不同的知识传统。哈耶克提出的知识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转换为“如何把不同的知识传统融合为总的人类知识传统”这样一个问题。我的研究表明,对话,是融合各个知识传统的比较合理的方法。当然,它也是协调跨学科知识的有效途径。

事实上,“对话”解放了我们每一个“知识者”——当作动词的知识,是开发知识的意思。由于参与着对话,每一个知识者都不必把超越他所在的那个特定角度当作必须完成的知识任务,因为凡倾听着对话的人,都已经超越了特定的角度。因此,知识的分工,因对话的发展而不断深入。

当然,随着知识分工的深化,对话变得日益困难起来。今天,专业知识分子几乎不愿意走出自己的领域去和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对话了。于是,各个知识传统都面临着“发展的危机”——它要么因持续封闭在自己的领域内而导致创造力的枯竭,要么因开放了日益封闭的领域而导致学术规范的瓦解。

这一危机也体现在我和叶航的对话当中,读者不难从我们的对话里感受到思想冲动与学术规范之间持续出现的对立,以及为维护思想自由和同时维护学术规范,对话者们所作的持续努力。

不论如何,我们的对话总比我们各自所可能撰写的专著更少束缚了我们的思想自由。在对话中,我们不必考虑超越各自采取的学术立场,从而我们可以深入到各自专业的内部。同时,我们尊重双方的学术思考,不断倾听双方的话语,从而我们可以超越各自专业的限制。

海德格尔说:“道说。道,经由我们而言说。”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倒数第二命题说:“我的命题应当是以如下方式来阐明作用的:任何理解我的人,当他以这些命题为阶梯而超越了它们时,终会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在登上高处之后他必须把梯子扔掉。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他就会正确看待世界。”附加一句,他的最后一个命题是:“对于不可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作者简介：

汪丁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叶航，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时代思想与艺术丛书

丛书策划：郑纳新

第一辑

- 《非常罪 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 毛 尖 著
《约会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札记》 梁 良 著
《东游记：现代伦理寓言》 许倬云 著
《良知与理论》 张汝伦 著
《都市漫游者：文化观察》 李欧梵 著
《寻回香港文化》 李欧梵 著
《艺术复仇——残雪文学笔记》 残 雪 著
《食物的往事追忆》 李玉莹 著
《语文教育门外谈》 钱理群 著
《争议人物——20世纪政坛札记》 金永华 著
《当代历史问题札记》 罗平汉 著

第二辑

- 《我的退思录》 钱理群 著
《有音符的树——台湾文学面面观》 许俊雅 著
《创作解释学》 李咏吟 著
《理性的追问——关于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对话》 汪丁丁、陈 杭 著
《中外绘画名作八十讲》 潘欣信 主编
《沐浴中的女性》 殷 伟 著



上海贝贝特

组稿编辑 范萍萍
责任编辑 范萍萍 伍 兵
装帧设计 刘 菲
版式设计 刘 凇



目 录

1. 理性的辨析与危机

- 3/ 对话(2002年8月)
- 25/ 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
- 49/ 叶 航:经济学的理性与理性的经济学
- 65/ 叶 航:批判与重构:现代经济学效用范式
反思

2. 理性与道德

- 93/ 对话(2001年6月—7月)
- 113/ 汪丁丁:道德基础与经济学的现代化
- 127/ 叶 航:谈经济学家的道德忧患
- 142/ 叶 航:经济学视野中的人类道德

3. 理性与信仰

- 157/ 对话(2001年7月—8月)
179/ 汪丁丁:行为学及神学视角下的经济学
201/ 汪丁丁:信仰的经济学
209/ 叶航:上帝、道德与效率

4. 理性与情感

- 219/ 对话(2001年8月—10月)
245/ 汪丁丁:“性”偏好的经济学解释
249/ 叶航:“爱”的理性与艺术

5. 理性的效率与演化

- 261/ 对话(2003年4月)
303/ 汪丁丁:“信誉”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
意义
318/ 叶航:利他行为的生物学与经济学解释
331/ 后记(叶航)

1

理性的辨析与危机

人的功能就是灵魂合乎理性的实现活动。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

对话

2002年8月

3

理性的
辨析与
危机

叶航：丁丁，你把经济学定义为“理性选择加实证方法”^①，如果先不探讨“实证方法”，我们能否界定一下“理性”的含义？就我的认识，“理性”这一范畴在经济学与哲学中有很大区别。我写文章或者上课时，往往要在它前面加一个限定词，称作“经济学理性”或“哲学理性”，虽然有些不伦不类，但我觉得不作这样的限定就无法清楚地表达“理性”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多重思考维度。

汪丁丁：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大约是《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②，文中我提出，100多年来的经济学发展，大致可以看作是一场“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但正如你所说的，由于对“理性”一词诸多的不同理解，在阐释“经济学理性”的含义之前，我必须简要地把这一解释按其推理步骤列举出来：

(1) 经济学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产物，而不是欧陆思辨哲学的后代。经济学家必须把自己的理论置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① 汪丁丁：《行为学及神学视角下的经济学》，见本书第179页。

② 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见本书第25页。

(2)经济学是“经世之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经济学家必须对每日每时发生着的“日常事件”作出解释，而这些事件的基本描述只能是统计性的，只能是那些服从“大数原则”的事件；

(3)在对所有那些服从“大数原则”的日常事件起了支配作用的力量中，最重要和最持久的两种力量是“人的自利本性”和“人的宗教倾向”；

(4)经济学理性主义坚持“人的自利本性”是一切经济行为的(至少是经济行为研究者的)出发点，这是亚当·斯密《原富》的核心思想，也是被作为“经济学帝国主义”里程碑的贝克尔 1976 年的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的核心思想。

但当我们转向当代思想家们从“认识论过渡到新本体论”的视野时，我们无法忽视麦金太尔的批评：任何“理性”都是在具体思维传统之内的理性。就西方传统而言，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的思维传统：(1)亚里士多德传统。(2)奥古斯丁传统。(3)苏格兰启蒙传统。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东方思维传统(包括印度吠陀学派、佛教、禅宗、伊斯兰、波斯……)。处于不同传统的个体所得出的“理性”判断，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是被处于其他“理性”传统中的个体认为“非理性”立场的。因而，在“文化研究”的论域里研究文化冲突固然有意义，却无法提供给我们整体性的解决框架。于是，在我看来，生活在现代或后现代的经济学家们(或者至少是理论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再次追问黑格尔和韦伯反复追问的那个古典问题：什么是理性？关于经济学“理性”含义的经典性看法大致如下：

(1)经济学“理性”的第一个含义是“人的自利性”假设。虽然这只是一个“工具主义”的假设，但在亚当·斯密

那里,人的双重本性原本是包括“自利性”和“社会性”的,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但是,在当代主流经济学中,尤其对目前最重要的一批经济学家(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贝克尔,还有阿尔钦)来说,人的“社会性”归根结底是基于人的“自利性”基础之上的,而人的“自利性”则是生存竞争和社会进化的结果。换句话说,经济学家观察到的社会竞争的幸存者都好像是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那些不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已经在竞争中消亡。

(2)经济学“理性”的第二个含义是“极大化原则”(也可以表示为“极小化原则”)。这是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所作的贡献,也是奥地利学派发起的“边际革命”的结果。它承接着边沁的功利主义道德哲学,同时引进了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个体对自身最大“幸福”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痛苦”,导致形式逻辑上的“极大化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理性选择”将幸福扩大到“边际”平衡的程度:个体为使“幸福”增进一个边际量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等于这一努力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在马歇尔看来,决定人类行为最基本和最持久的力量是经济的和宗教的。这一看法已经被现代经济学遗忘了。在萨缪尔森看来,宗教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可以通过效用函数的参数来反映,从而一切人类行为归根结底都可以由极大化效用函数来解释。

(3)经济学“理性”的第三个含义,是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这导致了“社会博弈”的现代看法。

理论要求以最少的公理解释最多的现象。放弃人的“利他性假设”是经济学必须走的一步。这在1950年由两位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完成了。阿尔钦是最早提出“自利性”

作为一种“工具主义”假设的经济学家。根据进化论的叙述逻辑,阿尔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芝加哥观察从洛杉矶出发向着芝加哥行进的一群赛车,我们不知道它们中途会走哪条路,不知道哪条路上有加油站,从而不知道这些赛车哪些能够到达终点。但是我们知道,那些到达了终点的赛车必定是选择了有加油站的路,这些赛车手可以是盲目地选择路径,但是那些到达终点的一定是路过了加油站的。所以,我们不妨假设所有在芝加哥被观察到的赛车都“理性”地选择了有加油站的道路。弗里德曼则提出一个简单的随机模型,证明一个按照随机游动花钱的、完全非理性的消费者最终(如果能够生存下来被经济学家观察到的话)会被迫在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上停下来。这说明我们可以“工具性”地假设一切消费者都是“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

这样,从进化论的论据出发,经济学“理性主义”提出了“效用最大化”假设,或更一般的“极大化原则”。在数学表述上,“最大化”不同于“极值”。后者只是“最大化”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极大化原则”使经济学家可以建立“理性”行为的数学描述,并且提出定量命题用于经验检验。所有这些命题都是从基本假设推导出来的,从而都是经济理论为“真”的必要条件。

叶航:按我的理解,经济学“理性”最关键的含义就是“极大化原则”。“自利性假设”和“一致性假设”只是“极大化原则”的前提,是对“极大化原则”的某种限制和规定,从而把这一原则限定在以下两个“边界”内:

(1)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是个人效用或单个厂商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某个集体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从个人(包括厂商)的行为出发进而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内在机制作出描述,就必须以人的“自利